

主 编 中 振 主



展望 21 世纪

中国经济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现状与展望

展望 21 世纪中国经济

王振中 主 编
周 学 副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展望 21 世纪中国经济/王振中主编.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12

ISBN 7-227-02223-4

I. 展… II. 王… III. 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373 号

展望 21 世纪中国经济

王振中 主编

责任编辑	姚毅 何志明
封面设计	胡国旺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地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网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ms@public.ye.n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x 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30 千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000 册
书号	ISBN 7-227-02223-4/F·151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发展是新世纪世界经济面临的艰难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选择这样的课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阶段。同时,我们在迈入新世纪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好,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选择这样的时机编写出版《展望 21 世纪中国经济》一书,就是要通过学者的独特视角和系统的研究,反映出上述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展望 21 世纪中国经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全书共分十三个专题,第一个专题“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展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研究员撰写的,着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规律,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结合以美国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微波化的新趋势,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可能走向。第二个专题“21 世纪前 20 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前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撰写的,他在对国家经济增长与贸易规模、经济全球化背景和新的贸易规则等深层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第三个专题“中国金融业的现状与未来”探讨在即将加入WTO的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市场发展问题。第四个专题“中国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分析及展望”研究新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问题。第五个专题“中国特区经济:存续意义、发展现状与展望”侧重回答了一段时期以来特区问题上的争论,提出要以新的思维看待特区。第六个专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前景”。第七个专题“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与前景展望”涉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第八个专题“中国知识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与未来展望”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传统产业的改造问题。第九个专题“深化国企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改革的主导者及改革的环境等分析入手,指出改革的艰巨性。第十个专题“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现状与展望”在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及就业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2020年中国劳动力需求因素。第十一个专题“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提出用“非农化”的提法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途径问题。第十二个专题“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未来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第十三个专题“中国21世纪收入分配展望”则对未来20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可能发生的变化用计量方法进行了预测,并据此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总体来看,第一、第二两部分是从宏观及国际贸易大环境下展望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至第八

部分对重要产业、行业及区域经济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九至第十二部分探讨的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及市场条件；最后是研究居民生活的改善，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展望。

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是所掌握的资料和深入的研究，而要将这种展望真正做到客观、严谨，避免简单化和盲目性，则正是我们经济学家所要努力追求的。《展望21世纪中国经济》这部著作，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实现经济的发展作出的分析、判断及展望具有开创性的思路与见解，我相信该书对认识中国国情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是能有所帮助的。当然，新的思路和见解会引发新的争议和探索，这也正是本书作者所期待的。

刘国光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八日

目 录

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展望·····	刘树成(1)
21 世纪初的前 20 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前景 ·····	王振中(19)
中国金融业的现状与未来 ·····	陈建华(37)
中国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分析及展望 ·····	臧旭恒等(75)
中国特区经济:存续意义、发展现状与展望·····	翁君奕(105)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前景·····	魏后凯(120)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与前景展望·····	周 学(143)
中国的知识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与未来 展望·····	安东建(159)
深化国企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韩朝华(185)
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现状与展望·····	王 诚(212)
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非农化 ·····	顾海兵(246)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	刷锦文(263)
中国 21 世纪收入分配展望 ·····	蔡继明等(287)

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展望

刘树成

一、半个世纪的回顾:9个波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工业化历程。半个世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也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①,即社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一起一落相交替的周期波动过程。半个世纪来,中国经济的波动可分为9个波。我们以GDP增长率的波动来考察,在1953~1999年的47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这9个波分别是(见图1和表1^②):

第1轮波动:1953~1957年,历时5年;

第2轮波动:1958~1962年,历时5年;

第3轮波动:1963~1968年,历时6年;

第4轮波动:1969~1972年,历时4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页。

②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5轮波动:1973~1976年,历时4年;

第6轮波动:1977~1981年,历时5年;

第7轮波动:1981~1986年,历时5年;

第8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

第9轮波动:1991~1999年,历时9年。

以上,在第1轮和第5轮波动中,包含有两个较小的波动。第1~8轮波动,平均每轮波动的时期长度为4.75年,而第9轮波动为9年,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现在,我们以1978年为界,考察一下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峰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高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扩张的强度。但如果峰位过高,扩张过强,往往会导致其后的波谷过深;而如果峰位过低,扩张微弱,则表明经济增长乏力。每轮波动内的峰位均以适度为好。改革前共有5轮半波动(1953~1978年),最高峰位是1958年,GDP增长率为21.3%。这一时期,平均峰位,即各波峰年份(1956、1958、1964、1970、1975、1978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15.7%。改革后共有3轮半波动(1979~1999年),最高峰位是1984年,GDP增长率为15.2%。这一时期,平均峰位(1984、1987、1992年)为13.7%,比改革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性。

(2)谷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深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的状况也称作波动的性质。波动的性质有两类:如果谷位为负,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GDP出现绝对量的下降,称作古典型波动;如果谷位为正,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正值,则称为增长型波动。改革前的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改革后均转变为增长型。改革前的最深谷位是1961年,GDP增长率为-27.3%。改革前的

平均谷位,即各波谷年份(1957、1961、1967、1972、1976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5.1%。改革后的最深谷位是1990年,GDP增长率为3.8%。改革后的平均谷位(1981、1986、1990、1999年)为6.2%,比改革前上升了11.3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谷位的上升极为显著。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增强了抗衰退力。

(3)平均位势。这是指每轮波动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总和的经济增长水平。改革前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1%;改革后1979~1999年为9.6%,比改革前上升了3.5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4)波幅。这是指每轮波动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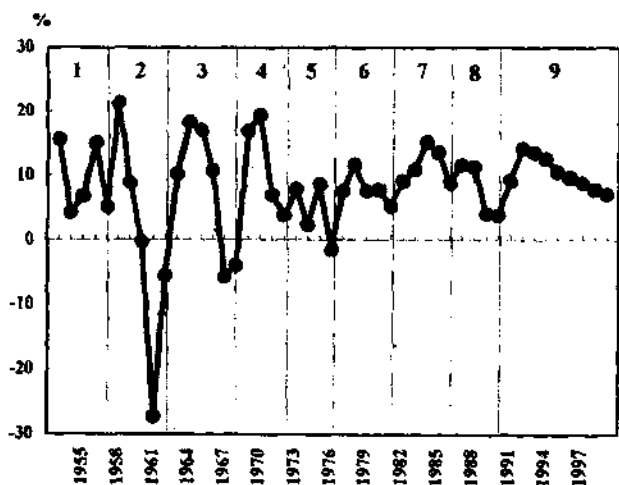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9轮波动(1953~1999年)

它表明每轮波动中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波幅可分为上升期波幅与下落期波幅。上升期波幅是指前一轮波谷与本轮波峰之间的离差;下落期波幅是指本轮波峰与本轮波谷之间的离差。改革前的

上升期波幅平均为 19.3 个百分点,改革后为 7.7 个百分点,减少了 11.6 个百分点;改革前的下落期波幅平均为 21.7 个百分点,改革后为 7.0 个百分点,减少了 14.7 个百分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前下落期波幅最大的是 1958 年的峰与 1961 年的谷,下落波幅达 48.6 个百分点,成为“大起大落”的典型。改革前后相比较,波幅的减小极为明显。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稳定性。

表 1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波动序号	年 份	GDP 增长率 (%)	波动序号	年 份	GDP 增长率 (%)
1	1953	15.6	6	1977	7.6
	1954	4.2		1978	11.7
	1955	6.8		1979	7.6
	1956	15.0		1980	7.8
	1957	5.1		1981	5.2
2	1958	21.3	7	1982	9.1
	1959	8.8		1983	10.9
	1960	-0.3		1984	15.2
	1961	-27.3		1985	13.5
	1962	-5.6		1986	8.8
3	1963	10.2	8	1987	11.6
	1964	18.3		1988	11.3
	1965	17.0		1989	4.1
	1966	10.7		1990	3.8
	1967	-5.7	9	1991	9.2
4	1968	-4.1		1992	14.2
	1969	16.9		1993	13.5
	1970	19.4		1994	12.6
	1971	7.0		1995	10.5
	1972	3.8		1996	9.6
5	1973	7.9		1997	8.8
	1974	2.3		1998	7.8
	1975	8.7		1999	7.1
	1976	-1.6			

二、第 9 轮波动的特点

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第 9 轮波动。其波动的时间长度为 9 年,比前 8 轮波动均长,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下落期由过去的平均

2.5年,延长至7年。在第9轮波动中,1991~1992年为上升期,1993~1999年为下落期。这个下落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93~1996年,中国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就是:其一,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既没有出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严重的负增长局面,也没有重蹈我国历次波动中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的覆辙;二是,经济增长率虽处于较高的位势(7%以上),但处于连续几年的下滑之中。

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或者说,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难度加大?这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除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之外,就国内因素来看,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这三者交叠重合的时期,或者说是体制背景转换、增长态势转换、市场环境转换这三大转换交叠重合的时期。

1. 体制转轨的深化期。

经济的波动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启动时和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表现为“启动容易刹车难”;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则表现为“刹车容易启动难”。

为什么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启动容易刹车难”?这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软化。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投资为“财政主导型”。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无偿的。80年代中期,经过初步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拨改贷”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投资转为“金融主导型”。但银行资金名

义上是有偿使用的,而实际上则是“借钱可以不还”,银行担当了“二财政”或“准财政”的角色。投资由过去“吃财政的大锅饭”转向“吃银行的大锅饭”。这样,每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一注入资金,一放松银根,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资金,经济一启就动。而当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不愿意立即罢手,惟恐先刹车者吃亏。整个经济的高速扩张,直到难以维继时,才不得不急刹车。这就是说,在原有体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开不易关。从建国以来历次的启动看,每次一启动,经济增长率在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非常大。1954~1992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年份共17年(见表1)。在这17年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以下的年份,即微幅上升的年份,只有4年;而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多达13年,这其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5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即强幅上升的年份,就有9年,占全部经济增长率上升年份的53%。这就形成了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盲目扩张冲动和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

为什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刹车容易启动难”?美国研究经济波动问题的著名学者哈伯勒,曾指明了市场经济下的这种不对称特点。他写道:“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了使信用代价低廉和供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由此可见,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① 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之所以“刹车容易启动难”,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硬化,一是借钱必须要还,二是

^① 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对周期运动的理论分析》,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6页。

投资必须考虑赢利。当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投资前景不看好,不论是银行放贷还是企业借款,都必然要谨慎。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惟恐刹车不及而吃亏。这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关不易开。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和“软着陆”之后,特别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示下,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深化,特别是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管理,由此,使资金约束硬化。资金约束的硬化,一方面,消除了长期以来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的体制基础,对于抑制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下子还不适应的情况。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不适应:

(1)企业的不适应。一是企业吃惯了“财政的大锅饭”和“银行的大锅饭”,一下子还不适应“借钱必须要还”的硬约束;二是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包袱很沉重,一下子还不能轻装上阵;三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由此,企业作为独立的投资主体尚未成熟,加之经济增长率的连续下滑和通货紧缩,投资缺乏赢利的好前景,使企业出现“惜借”的倾向。

(2)银行的不适应。一是银行当惯了不负盈亏的“出纳”,尚未形成积极主动地去追寻和判断哪些投资项目能赢利的能力;二是银行亦有沉重的不良债权的包袱;三是银行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由此,银行作为商业性的经营主体也尚未成熟,加之投资前景不看好,使银行出现“惜贷”的倾向。

(3)资本市场的不适应。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发育的过程之中,远未成熟。由此,使直接融资渠道还很狭窄。

综合以上分析,本来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就存在着“刹车容易启动难”的不对称特点,加之我国的资金约束刚刚开始硬化,这次“软着陆”之后的启动是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领

域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但整个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背景下的第一次启动,各方面都需要有一个适应与完善的过程,这就更加大了启动的困难。由此,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单靠降低利率和放松银根的手段,或由中央财政独撑整个的启动,都是难以奏效的。要使经济稳健地回升,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主体的成熟,这其中,特别是要激活社会与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激活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2. 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

中国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改革前 1953 ~ 1978 年的 26 年里,为 6.1%; 改革后, 1979 ~ 1990 年的 12 年中, 高达 9%; 1991 年到“软着陆”成功之前的 1995 年, 即“八五”时期, 更高达 12%; 1979 ~ 1999 年这 21 年中, 为 9.6%。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必然会逐渐累积和隐含经济结构的失衡, 其中, 最值得重视的是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 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失衡。

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各自所占的比重, 即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 是比其他的结构问题(如供给面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需求面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更高层次或更具基础性的结构问题。在投资效益为一定的情况下, 长期而高速的经济增长, 必然依托着高的资本形成率, 相对应的就是低的最终消费率。如果资本形成率过高, 而最终消费率过低, 则会引起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 造成消费市场相对狭小, 从而使投资失去目标, 整个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运行。

图 2 给出了我国按 1952 年不变价计算的、1952 ~ 1996 年最终

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净出口和误差率三条曲线。^①从图2我们看到,最终消费率1981~1996年呈现出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在1981年为61.2%,1996年下降为51.4%,下降了9.8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在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最终消费的绝对额是在不断扩大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缩小。打个比方说就是,社会总产品这个蛋糕不断做大,所切下来的最终消费部分也在不断增大,但所切下来的最终消费这部分占整个蛋糕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1981~1996年,资本形成率平均高达41%,特别是1993年、1994年、1995年,更分别高达42%、43%和45%。图3和图4给出了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所绘出的1962~1996年中国、韩国、泰国、日本的总消费率(含统计误差率)、国内总投资率曲线。^②与我们的周边国家相比,韩国和泰国的总消费率也是长期处于下降的趋势中,它们的总投资率也长期处于上升的趋势中。这表明,我国和韩国、泰国一样,同属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但是韩国的总消费率在1988年降到61%之后,逐渐有了一个上升趋势。泰国的总消费率在1991年下降到64%之后,也保持了一个平稳的态势。而我国的总消费率却一直下降到1996年的56%。这在世界各国已属极低的总消费率了。根据世界银行所列出的有关国家的资料,1996年,总消费率最低的是新加坡(49.5%),我国略高于新加坡,而低于马来西亚(58.1%)、泰国(64.7%)、韩国(65.8%)、印度尼西亚(66.8%)。日本曾在1965~1970年呈现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态势。这期间,日本的国内总投资率由31.88%上升到

① 资料来源:按1952年不变价的计算,使用了最终消费指数和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这两个指数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

39.02%，总消费率由 66.72% 下降到 59.7%。但随后，其国内总投资率呈下降趋势，总消费率呈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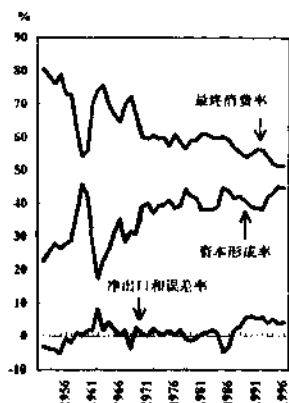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净出口率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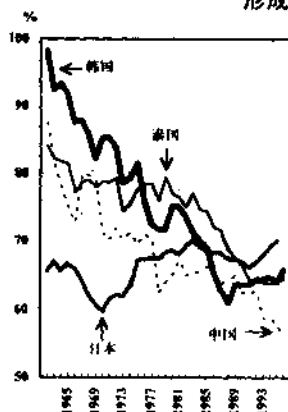


图3 各国总消费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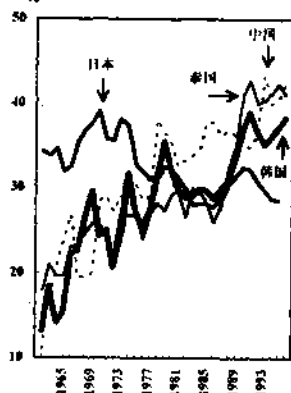


图4 各国国内总投资率

为了恢复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的正常比例关系，就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暂时降低一些，但会